

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

第二辑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目 录

- 一、回忆在重庆与周恩来的一次会见
..... 费 炳 (1)
- 二、中共滇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概况
..... 黄 平 (7)
- 三、回忆开广地区的战斗
..... 孙太甲 杨肇焱 (37)
- 四、回忆党领导下的一个秘密印刷厂
..... 徐庆华 (62)
- 五、从云南到贵州——革命回忆录
..... 段一芳 (87)
- 六、回忆王德三同志英勇就义
..... 赵国徽口述 陈颖 陈峻 记录 (99)
- 七、李鑫烈士传略..... 杨静珊 (103)
- 八、云南早期 (1925——1930) 地下
党情况答问..... 吴少默 (109)
附一：马逸飞同志的信..... (138)
附二：马逸飞同志批注的意见..... (139)
附三：本刊第一辑勘误表..... (142)

回忆在重庆

与周总理的一次会见

费 炳

回忆三十八年前，即一九四〇年底，我受当时中共云南省工委的委托，到重庆南方局汇报和请示党的工作。叶剑英同志热情地接见了，听取了汇报，并询问了云南各方面的情况后，他告诉我：俟向总理会报后，对云南党的工作再作指示。

一九四一年初，正当“皖南事变”的严重关头，我得到通知，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去，在和我接头的石磊同志处，得知皖南新四军在茂林地区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形势严重，并告诉我：总理要和我谈话。于是去请总理来，总理一见我即握着我的手说：“你来了，很好！有些问题要和你谈谈。”总理一开始就谈到了“皖南事变”的情况，说：“这几天国民党反动派正在以七

个师的兵力，把我皖南新四军军部、政治部机关，包围在茂林地区，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我皖南新四军的处境危险。”

随即分析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广大人民及爱国人士对国民党的专横不满与对共产党的同情，国民党反动政策及其内部的各种矛盾，及我党的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他说：“只要我党我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针锋相对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是能击退这次反共高潮的。不论形势如何严重，前进道路上如何艰难险阻，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总归要失败的，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但在此反共高潮的形势下，也可能波及到白区的党组织。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为了防备万一，保存白区的革命力量。南方局决定：云南地下省工委的同志暂行疏散荫蔽，俟大风大浪后，同志们还在就好了，这也是斗争的一种方式。”接着总理就谈到了毛主席指示的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方针。并指示我“仍埋伏在滇军中，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俟将来形势发展，必要时上级组织派人来联系。在疏散荫蔽期间，遇到过去的同志，不谈组

织问题”。最后总理谈到“以现时情况估计，国民党反动派还不敢蓦然和我们全面破裂，但也不能不有所防范。你们云南的同志，若有可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危害，万不得已需要转移时，还可以从越南方面转移出去。我们在重庆则不同，在国民党巢穴里，需要转移是困难的，我们只有坚决地同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的斗争到底。即使遭到逮捕，甚至牺牲生命，也是为党尽了力量。我们在重庆的同志若遭受危害，那更能激起我党我军在毛主席正确领导下的坚强斗志，也更能激起全国广大爱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恨，更认清其反动咀脸……”等等。

我听了总理的指示和教导后，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示，使我因发生“皖南事变”而感到不安的心情豁然开朗。总理对我的一番谈话，是代表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总理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精辟分析，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对挽救民族危亡的信心和决心，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以及对云南地下党的关怀备至，使我深受感动，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为此，更增加我对党的革命事业不懈奋斗的自信心和力量。

中共云南地下党从一九二六年第一次建党以后，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实行清党后，云南党受到国民党反动派云南地方军阀的迭次残酷镇压，使党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云南地下党的许多同志，曾作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一些同志被关进了牢房，一些同志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在那“雪压冬云白絮飞”，“高天滚滚寒流急”严峻的白色恐怖下，个别不纯分子叛党投敌，作了可耻的叛徒；有的悲观失望，有的消极等待；但也有的同志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反而更激起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仇恨，继续战斗。这时，我通过李浩然同志到上海找到了党的联系，积极准备重新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一九三五年由于党中央对白区革命的关怀，由上海派李浩然同志来滇，会同我第二次重新建立了中共云南地下党的组织。一九四一年，负责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总理，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又亲自布置了云南省工委的疏散荫蔽。并先派涂国林同志，不久又派郑伯克同志来滇，重新组成新的省工委，依靠过去原有的同志为骨干，继续发展党的工作，直到云南解放。总理在直接领导白区工作的年代中，正确贯彻执行了党的各

项方针政策，使云南地下党从党第二次建党后，继续推动了党的工作不断胜利前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云南地下党为党做了许多应做的工作，本来是无可非议的。而林彪、“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帮派人物却对地下党进行全面的“围剿”，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他们多次发表秘密讲话，设立从上到下的专案审查，並出了报刊，把广大的地下党同志戴上“叛徒”、“特务”、“反革命”、“内奸”、“三反分子”、“走资派”、“牛鬼蛇神”、“一伙坏蛋”等帽子，妄图一棍子打死。他们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或以想象代替事实，抓着一点，无限上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打伤打残，被迫致死，並株连其家属，凡此种种，罄竹难书。他们表面上诬蔑迫害云南地下党，其实质则在于攻击周总理，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分清是非，落实党的政策，云南地下党的问题，才开始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云南地下党，是与周总理的领导直接关联

的，在周总理的正确领导下，中共云南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经过长期的城市斗争和农村武装斗争，最后配合南下的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全云南。

一九七九年九月

中共滇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概况

黄 平

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了蒋介石的进攻，转入大举反攻。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一形势，向全国人民发出如下号召：“为了早日打倒蒋介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我们号召全国各界同胞，在本军到达之处，同我们极积合作，肃清反动势力，建立民主秩序。在本军未到之处，则自动拿起武器，实行抗丁抗粮，分田废债，利用敌人空隙，发展游击战争。”（《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四卷，第一一八三页。）根据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向黄平、欧根同志交代：在一九四六年我党和国民党反动派谈判破裂后，南方局即指示省工委，把昆明地下党的干部，分批输送到农村，在滇东开展革命游击战争的条件已逐步成熟。但自一平浪以西，整个滇西广大地区却还是空白。滇西有红二方面军长征路过的影响，一九四一年，

一批地下党员曾在那里传播过马列主义；一九四六年，地下党个别党员曾在鹤庆师范作过工作，有一定基础。但只有两个地下党员，亟待加强组织领导，开辟工作。因此，省工委决定派黄平、欧根同志先到剑川，执行毛主席和上级党委指示，要求在一年之内搞起武装斗争，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早日解放云南创造条件。我和欧根同志，于一九四七年底先后到达剑川，按党的指示和毛主席的教导，积极开展工作。

一、依靠和放手发动群众，

建立党的坚强组织

首先，我们将秘密建党与公开组织群众相结合，在斗争中建党。在经过斗争考验的进步学生和青年工人、农民、以至国民党基层士兵群众中，个别秘密吸收党员。四八年一月，经过吸收鹤师学生十余人入党后，即派他们分赴剑川、丽江、鹤庆、兰坪、永胜、中甸、乔后特区（包括上下江和漾濞县）、兰州特区（包括马登街和通甸）等八个县区开展工作。随后由省工委陆续派来干部，至四八年下半年，又先后在保山、祥云、弥渡、蒙化、大理、宾川、邓川、凤仪、云龙、维西、牟定、楚雄、一平浪等县区建立党的

组织。

同年五月，经省工委批准，建立了滇西工委。滇西工委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情况，在积极建党的同时，又对那些具有革命要求，但暂还不具备党员条件的积极分子，秘密地把他们分别吸收到“民主青年同盟”、“工人抗征会”、“农民抗征会”、“民主妇女联合会”、“士兵联谊会”等党的外围组织中。一九四八年底，党的这些外围组织，已秘密发展到万余人。为了把各种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群众迅速组织起来，形成革命的力量，便以党员为核心，以党的外围组织为骨干，在群众中进行了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采取合法形式，建立了各种公开的群众组织，如“工人识字班”、“妇女识字班”、“师生联谊会”、“青年联谊会”，“歌咏队”、“兄弟会”、“姊妹会”……等，把各方面的群众都团结在党的周围，初步形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群众力量。

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以剑川为例，一九四八年夏，剑川兰州发生强烈地震，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剑川伪县政府，坐视无睹，见死不救。地下党通过

各种公开的群众组织，在剑川发动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救灾运动，公开募捐，组织救济，这不仅帮助兰州受灾群众克服了一些困难，而且锻炼了党领导的各种群众组织，扩大了党的影响。随后，在剑川中学发动了学生罢课，在乔后盐矿，又发动工人为反对通货膨胀，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运动，先后罢工达半年之久，给国民党在滇西北地区的财政收入造成了极大困难，迫使他们不得不对盐矿工人作了让步。在农村，以贫雇农为主的农抗会员，带领农民，对国民党乡保政权派出抓丁要粮的武装乡丁，进行了袭击，在洱源上江还缴了他们的枪。抗丁、抗粮、抗税的“反三征”运动蓬勃开展，使当地乡保政权逐步陷于瘫痪和半瘫痪。不论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胜利，不仅鼓舞了群众，更重要的是群众通过保卫自己切身利益的斗争，进一步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才能翻身求得解放。乔后盐矿工人的罢工，从增加工资的经济要求，发展到推翻国民党的政治斗争，典型地说明群众在斗争中政治觉悟提高的过程。

建立发展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孤立顽固分子。一九四八年滇西群众斗争发展较快，其中一

个重要因素是我们较好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这为我们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区进行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剑川伪县府教育局长赵鑫象先生，经过党对他的教育，他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积极支持了党的工作。由于他的帮助，我们掌握了剑川四乡五镇中小学的全部领导权，给党员提供了较好的掩护，这是当时滇西北统战工作的一个范例。此外如凉山彝族上层人士余海清，傈僳族上层人士裴阿欠，纳西族上层人士习自成等先生，都在不同程度上起过积极作用，各地党员还利用自己各种社会关系，尽可能争取当地国民党上层人物保守中立。剑川伪县长张积厚、滇西盐场公署伪场长赵诚义，曾几次想对我地下党进行镇压，但因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极高，使国民党反动派在朝或在野的军政官员，以及他们所控制操纵的封建会道门哥老会等，内部发生剧烈分化，一部份积极向党靠拢，一部份保持中立，少部分虽怀有敌意，也不敢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滇西工委还开展了西康的工作，在巴塘地区发展党员并建立了“东藏民主青年同盟”，他们后来在解放军进藏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通过上述多方面的工作，依靠和放手发动群众，建立了党的坚强组织，为滇西建立武装，建立根据地打下良好基础。一九四九年一月，祥云坝区由反三征开始，举行了武装起义，摧毁一部分伪区乡政权，缴获步枪六十余支，在南山建立了滇西第一支人民武装，后来迅速发展壮大，整编为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八支队。关于滇西方面的情况，将另由滇西地委的同志们去叙述。下面我将主要叙述滇西北的情况。

二、永胜程海之滨，首次起义失败

“四·二”剑川起义，获得完全成功

一九四八年九、十月间，永胜地下党在河口村地区开始秘密组织武装队伍，是滇西地区最早掌握武装的县份之一。至四九年一月，已发展到二百人左右，步枪百余支。此时他们求胜心切，没有坚决执行滇西工委指示，在县委主要负责人王宁同志到剑川汇报工作之际，竟公开发动起义，向永胜县城进攻。由于缺乏斗争经验，部队行至程海边上的海腰铺，中敌罗瑛部千余人的伏击，当场阵亡及被俘后杀害的同志共二十七人。滇西工委交通员谢海量同志被俘后，两次逼供、假枪毙、砍去左右两手，最后一次刑场逼供，仍英

勇不屈，保守了党的机密，为革命壮烈牺牲。滇西北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了！同志们的鲜血教训我们：即使掌握了武装，如果没有和广泛的群众斗争相结合，也可能完全失败；对打着“革命”旗号的各种非党武装，必须要保持足够的阶级警惕。革命的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决不能感情用事，必须坚决服从和依靠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永胜暴动失败了，这失败使永胜地区的工作暂时受到挫折，但却为滇西北地区的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一九四九年二月中旬，以洱源乔后为中心的罗穗特区党委，以当地伪乡政权的名义，建立了以白族贫雇农为主要成员的“洱源上江自卫中队”，有五十多人，四十多支各色步枪，这支武装依靠工人、农民的支持，在敌政府机关中我地下党员的密切配合下，第一次伏击直属伪中央的乔后盐场税警大队，击毙四人，缴获四支枪和他们上交伪国库的二千八百多银元和十三万伪现钞，我方无一伤亡；此后又连续进行多次伏击，沉重地打击了税警队的士气，而更重要的是迷糊了敌人，调动了敌人，使敌人把守剑川的兵力分了一部份驻守乔后，为我们解放剑川创造了有利条

件。

四月二日凌晨，剑川武装暴动开始了。暴动前，滇西工委和剑川县工委反复多次讨论，制订周密的行动计划。我们没有费一枪一弹，于二日零时以前，徒手奇袭县城东西南北的伪乡公所，共缴获步枪约六十余支。凌晨二时在县城集中时，加上鸟枪、长矛、“火油桶燃鞭炮”，迅速组成一支向伪县府进攻的队伍。伪县府常备队二〇〇余人，经我县工委派党员进行瓦解争取工作，发展了一些党员和“民主士兵同盟”的成员，因此在进攻时，里应外合，仅仅三个小时就胜利地结束战斗。缴获步枪八十余支，子弹、手榴弹约八十余箱；并动员了伪县医院的医生护士，带着所需的医药器械，参加了起义的革命部队。我们攻下了剑川县城之后，随即撤离，转移到沙溪休整训练。在这次战斗中，陈祖芳同志英勇牺牲。

剑川伪县府被打破之后，敌人惊恐万状，但又不敢上报“军情”，却匆忙从乔后调回兵力，加上回乡搜集的残余乡丁共约百余人，把守县城，宣布戒严，妄图困守顽抗。却不料我游击队在群众掩护下，早已埋伏城内，于四月十九日，出其不意，全歼残敌，伪县长张积厚成了我们的俘

虏。这就是“二打剑川”，剑川县伪政权从此即被我军彻底摧毁。拥有人枪二百余的第一支滇西北人民武装——剑川大队，建立起来了。

三、云南封建势力不愿退出历史舞台，

滇西北各族人民坚决粉碎“共革盟”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左右，滇西北地区突然出现一个极其险恶的形势：在东面，鹤庆被永胜来的一股敌人打下了，他们打出的旗号是“滇康共革盟民主联军”，总司令史华（伪丽江专署专员）、付司令员罗瑛。在他们的欺骗和裹胁下，人数约有数千之众，气焰十分嚣张。对土司头人，封赠为各路指挥，以虚张声势。在西面，云龙、石门却被“保山共革盟第四支队”所占据，人数约一千四百多，其中骨干力量是伪二十六军的三个连（邓森、李光宗、余××）和以李汉良为首的保山特务小组以及他们所组织的大洪山帮会。另一股“保山共革盟七支队”，是蒲缥地主武装欺骗部份青年及农民纠合起来的，共约数百人，在泸水、碧江一带活动。云龙、兰坪一带的地主武装，这时也纷纷“据寨称王”，打出“共革盟”旗号，人枪多少不等。在南面，以保山伪警察局长杨剑虹为首的地霸武装，也打着“保